



中 華 文 庫

初 中 第 一 集

唐 太 宗

何 天 行 編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MG
K827.42
2



3 1764 1893 1

唐太宗目次

一	從東晉到隋末的中原局勢	一
二	李唐的開國	六
三	李唐的世系和太宗的生平	一一
四	玄武門之變	二七
五	十八學士登瀛洲	三五
六	太宗的武功	三九
七	太宗的治績	五一
八	唐初的制度與文教	六二
九	結語	六六

目次

一

唐太宗

二

唐太宗

一 從東晉到隋末的中原局勢

我們爲認識唐太宗的所以成功一代英主，和他的淵源背景起見，將東晉以來到隋末的中原局勢，先說一個大略。

東晉自和氏族的苻堅在淝水戰後，形勢一變，本來盤據在北方和西北一帶占有相當勢力的邊徼種族，如苻堅盛時都在他部下稱臣的鮮卑和羌，自苻堅在淝水戰敗回到長安死去以後都背叛了他，這些種族所建立的「國家」也因淝水一戰而動盪起來，由不斷的戰亂、分裂，而漸次衰亡；晉室的半壁江山，雖幾次想恢復中原，但終於因被困偏安的局面下，內部又動亂不寧，以至國事日荒；關中的前秦、西燕既滅亡於前，山東、河北一帶的後燕和南燕等也不久被滅，五胡十六國的時代過去以後，晉室的傳統政治也同時終止了。

五胡十六國和東晉的傳統政治雖已過去，但從西晉末到南北朝初葉這一百三十四年之間，中國的政治局面却整個的發生了質的變化。一方面，是這些從漢末以來「亂華」的「五胡」替中華民族增加了大量的新的血統；一方面，因這些種族的勃起接著就演變爲南北朝對峙之局。

南北朝的對峙之局起於公元四三九年，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終於公元五八九年，即隋開皇九年。南朝自劉裕篡晉，國號宋，歷齊、梁至陳，共二百六十九年；北朝則先後有魏、北齊和北周，共一百九十五年。在這長約兩百年的時期之間，一切制度文物的變化，都將中國的歷史拉上了一個新的時代。將有一千年長久的漢族傳統政治，從先秦時代到晉末，遭遇到一個嚴重的壓迫，以前被目爲「四裔」或「夷」、「狄」的域外種族，到這時已在中原的土地上發生了有力的政治作用，即使是一支小部族，他們的武力也比當地的漢人強，而漢族的文化和政治權力，到這時代如強弩之末，只有日見薄弱，已無法振作起來了。同時，在黃河流域和西北一帶，却成了新興種族的英雄用武之地。復經兩三百年的長期

激盪，中原的局勢又一變，在南北朝時代結束的時候，整個中原總匯合流的趨勢，已成爲胡漢種族的共同目的。

配合這一個趨勢的，是隋文帝的統一南北朝。

隋文帝楊堅，弘農華陰人，他本來是後漢太尉楊震之後，四世三公，素爲中原望族，但在北朝做官的時候很久。文帝是楊震第十四世的子孫，他與塞外胡族的關係似已很深，他的父親楊忠，魏恭帝賜姓普六茹氏，大約是一個胡化的漢人，或者已經是屬於胡人的血統的。隋文帝小名那羅延，娶鮮卑族獨孤信第七女爲皇后，生廢太子勇及煬帝廣等，更混有漢胡血統。楊堅以他的軍事和政治的才能，替混亂了多少年的中國，又重新建立起統一的版圖，雖隋帝國的時期並不長，而楊堅却是劃時代的人物。

隋文帝在位時，「尙節儉，勤吏治」，愛養百姓，減輕賦稅，給連續三個世紀蒙戰亂之禍的北方人民好好的鬆了一口氣，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功勞。而且他將北朝的制度來推行全國，爲中古時期的中國文化奠下了一個新規模。

文帝死後，嗣位的煬帝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物。他生長在北方，對南方雖則豔羨，但很隔膜。他也有相當的膽魄和才幹，覺得從他父親手裏建造起來的隋帝國，版圖既這樣廣大，統治却實在費力。北方在三百年來天災人禍以後，遠不如江南的富足，要滿足他好大喜功的慾望，不得不先從經濟上著眼。必要的建設似不可少。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他覺得開鑿貫通南北的運河應該是維持隋帝國經濟源泉的大動脈，至於便利交通，溝通文化，那又是不用說了。於是煬帝集中了人力物力做去，結果這條維持帝國經濟的大動脈雖則完成，但一些被徭役派工的人民却恨極了他，煬帝的建設事業，在老百姓眼中只覺是勞師動衆，是一種騷擾。到大業三年以後，不巧又連年水旱，到大業六年，民間流亡的都紛起爲寇，攻陷州郡。就是運河附近，也發現了這些叛亂者的部隊，使煬帝一時無法可想。又過了三年，全國都變亂四起，其中有擁兵十餘萬，而自稱爲「唐王」的；也有在陝西一帶自立爲「皇王」而建元爲「大世」的；隋帝國到了這樣的地步，當然不免要趨於瓦解。

這時，從東晉以來破碎的中國，總算經過了三四十年的一統，重入紛亂狀態。政治缺了重心，歷史的漢族傳統政治，也只在當時人的腦中留下了回憶；匈奴族都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過號稱爲「漢」的國家，誰有力量，誰都能揭竿而起。

然而當時起來叛亂的，大都是盲目的，並無有目的的革命行動。雖則叛變者有不少是農民，但領袖中有的却是貴族。這些貴族都想利用農民的力量來取得天下，農民流血的結果，還是官僚和封建集團的領袖們掌握了勢力。

李淵就是當時許多官僚和封建集團們之間的一個。他靠着他兒子李世民的助力而禪了隋室，改國號爲「唐」。李淵是起於西北的，關中扼天下之要，隋文帝也在這一帶起兵，李淵憑藉了原有的勢力發動起來，由於關中地理的優越，又加政治重心就在這裏，所以他比李密、劉武周等在別地方的，有了成功的把握。

當時的環境，各方面都湊成了李唐成功的機會。加以李淵的兒子又人材傑出，時勢造就英雄，這數百年來在動亂中的中原土地，就很快的給李淵父子做了主人翁。

二 李唐的開國

當隋末各地叛變的部隊蠢起時，煬帝並不以為意，他叫「代王」楊侑留守長安，「越王」楊侗留守洛陽，此外特派留守太原的「唐公」李淵爲山西河東區域的撫慰大使，叫他勦捕「盜匪」，自己却跑到南方來巡遊。這時在山西做晉陽令的劉文靜見了李淵的兒子——唐太宗——李世民，知道他是個非常人物，就和李世民密切聯合。劉文靜原是長於計謀的，有一天，他因同黨連位犯罪下獄，李世民親自去探問，籌劃共謀大事，劉文靜勸他趁煬帝巡遊江南，江淮間又羣盜蠢起，一旦能集合十萬人，乘虛入關，就不難號令天下。李世民對這番意見極以爲然，就暗中準備一切，世民的父親李淵却全不知道。後來李淵漸漸聽到了世民和文靜等的計劃，覺得起而代之的意思「亦大有理」，李淵雖則還有些害怕，但世民已經「陰養士馬，欲舉大事」，也只好跟他發動了！

不久，突厥舉兵侵入西北，李淵因有防守之責，叫將軍高君雅同馬邑太守王

仁恭合力抵抗，結果却阻止不住突厥的侵入。煬帝在江都聽到軍事失利的消息，大爲震怒，要派使者拘捕他們去辦罪；李淵又嚇又急，世民知道事機已迫，再不能延緩了，於是與裴寂等乘機向他父親說：

『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困，坐取夷滅乎？』

這一番話，李淵聽了大以爲然。遂調集兵馬，大張反隋旗幟。其時，各地叛亂已起，官府防禦又不得法，正如通鑑所說：「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內史侍郎虞世基在煬帝面前力言盜賊充斥，請發兵屯守，煬帝還要罵他：「卿是書生，定猶懼怯！」（通鑑載這事在大業十二年七月）一面煬帝又不願聽人報告盜匪的消息，下面的官府有的竟不敢去告他。後來又殺了幾萬在匪區中的老百姓，這一來，更助長了人民反叛的心理。到大業十三

年六月，李淵的部隊已發動了，於是傳檄諸郡，明告天下。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聯合起來，向突厥那裏弄到一些馬匹，以加強自己的兵力，李淵也以爲然，親自寫信給突厥的始畢可汗，始畢可汗回答他的信上說：

『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

這信到達以後，李淵的將士都大爲高興。兵馬既足，李淵就遣長子建成和司馬劉文靜帶諸軍幾萬人屯永豐倉，扼守潼關，以防別方面的軍隊攻入。又使李世民帶領劉弘基的部隊幾萬人守渭北。李淵的女兒李氏——柴紹夫人——帶領了女僕馬三寶也集合了一些人馬，起兵應援。馬三寶說服了「羣盜」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聚衆到七萬多，這些部隊統歸李世民帶領。世民軍隊所到的地方，吏民及羣盜，都相率歸附，李世民將這些「羣盜」中的豪俊都收了起來，做了自己的部下，在涇陽屯駐時，有「勝兵九萬」。李淵將精兵萬餘人會合世民的部隊於渭北，李淵的女婿柴紹亦一併作戰，這些部隊總稱爲「娘子軍」，「娘子軍」的實力既雄厚，當時關中一帶，已顯然是李家的天下了！

接着，李淵到長安，在春明門西北聚衆達二十幾萬人。不久克京城，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圖籍，並定約法十二條。將隋室的苛雜禁令完全廢除。是年改元「義寧」，立代王爲恭帝，淵自爲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進封唐王。當時對煬帝還很客氣，因爲他仍巡遊在江都，就遙尊他爲太上皇。第二年春天，煬帝還想都丹陽以保江東，但跟着他在左右的都是關中人，這些人都不能擺脫自己的故鄉，不願意接受煬帝這個主意，結果煬帝被從駕的關中人宇文化及殺死，北方的隋恭帝也遜了位。隋帝國的地圖已變了顏色，李淵也就在太極殿裏卽了帝位，郊天大赦，稱國號爲「唐」。

武德（高祖李淵卽位後的年號）二年，河隴既定，李淵已無後顧之憂，於是舉兵東向。武德三年，世民討河東既平，進規河南北及荊襄。四年，世民進取東都。是年五月，世民破「夏王」竇建德於武牢，「鄭王」王世充亦力盡投降，至此河南、河北都歸唐所統治。之後又平兩湖，下嶺表九十六州。淮南地亦悉入於唐。隨着高羅八州和東海亦投降，總算天下大定，隋末的割據之局，至此又歸

入一統。

然當時討平天下之功，以太宗李世民的功績較多。李淵之能做皇帝，他原來似乎並不想像得到。但他既起兵以後，謀事即很穩妥，他遂尊煬帝爲太上皇，這反使他減少不少麻煩。唐書帝紀說李淵「聰明勇決，識量過人」，可見李淵也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他的成帝業是恰當其時的。

三 李唐的世系和太宗的生平

唐代大詩人杜甫曾有五首「諸將」詩，其中一首有兩句說：

「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

上句是寫吐蕃渡河故事，下一句是寫唐主之所由興起。「龍起晉水」，這在唐人的心目中似乎很明顯的觀念，高祖李淵不但做過晉陽太尉，而且是生長在那一帶的。據一行：并州起義堂頌說：

「我高祖龍翔晉水，鳳翔太原。」

冊府元龜亦說：

「高祖師次龍門縣，代水清，太宗生時，有二龍戲於門外林中，經三日，乃冲天而去。」

這種記載雖略近神話，然而高祖太宗之出身於西北，這是無疑的事實。兩唐書高祖紀，都說是：「隴西成紀人。」唐太宗自己也說：

「朕系出老聃，東周隱德，末葉承嗣，起自隴西。」

李唐之源出隴西，從來是沒有人懷疑過的，一切的歷史傳記大致也都這樣承認。只有宋代的朱子語類上說過這樣一句：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

朱熹這句話實在是發前人所未發。可惜他沒有詳細說明；但「唐源流出於夷狄」一語，朱熹必有所見而云然，決不會隨便指說。

關於李唐的氏族問題，已很爲近時學者所注意，首先提出這問題的，是陳寅恪先生。陳先生曾作李唐氏族之推測一文，他提出新發現的五點意見：

- 一、李唐自稱是西涼後裔是很可疑的；
- 二、李唐疑是李初古拔的後裔；
- 三、李唐先世與大野部關係亦深；
- 四、李重耳南奔之說似爲後人所僞造；
- 五、唐太宗重修晉書及勅撰氏族志之推測。

陳先生的這個意見，最初寫在清華大學的講義中。這發見不但很深刻，而且對於隋唐五代史的認識影響極大。在這裏我們不妨略說一個大概：

關於李唐先世的淵源和氏族問題，唐代皇室自己所撰的譜牒，原書現在已看不見了，冊府元龜和兩唐書等的記載雖保存了一部份史料，但還不是最完備最精確的記載。唐的世系據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載：

『（李）歆字士業，西涼後主。八子：暉，紹，重耳，弘之，崇明，崇產，崇庸，崇祐。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爲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拜恆農太守，後爲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生獻祖宣皇帝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祖光皇帝；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周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次曰乞頭，次曰太祖（虎）。』

如果將這系統列一個表，起自李熙，迄於世民，是這樣的：

李熙——天賜——虎——昞——淵——世民。

但在這一脈相承的傳統中，值得研究的地方却不少。前面已經說過，唐太宗自己曾說：「朕系出老聃，東周隱德，末葉承嗣，起自隴西。」這幾句話是說得很籠統的。老聃與唐有何淵源，是一個空洞而很可研究的問題。據事實推論，這句話當然並不可靠，這一點且留在後面再講。據新舊兩唐書高祖紀載，李淵「七世祖嵩，當晉末據秦涼以自王」。此說與宗室世系表所載李唐爲西涼李嵩之正支後裔之說自合，據唐會要帝號條載，李熙是李嵩的曾孫，李嵩據西涼時，爲東晉時五胡十六國之一。從李嵩到李熙的傳統如下：

李嵩——李歆——「重耳」——李熙。

然而在這傳統中間，却包含着重要史蹟。這就是陳寅恪先生所提出的，李唐實在是李初古拔的後代。李初古拔是誰呢？據宋書柳元景傳略說：

「（元嘉）二十七年八月，（隨王）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贛谷，奮威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十月法起安都方平諸軍入盧氏。法起諸軍進至方伯自，去弘農五里。……諸軍造攻具，進兵城

下。爲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謀以陵城，……安都軍副譚金薛係孝率衆先登，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二人。殿中將軍鄧盛幢主劉驃亂使人入荒田，招宜陽人劉寬糾，率合義徒二千人，共攻金門塢，屠之，殺戍主李買得，古拔子也。爲虜永昌王長史，勇冠戎類，永昌聞其死，若失左右手。」

魏書薛安都傳亦有類事記載，而較爲簡略。從宋書柳元景傳看，李初古拔的事蹟和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所載李重耳的故事有極相同的地方：李重耳姓名的第一字爲「李」，李初古拔姓名的第一字也是「李」，這是相同的第一點；「李重耳」在國亡以後奔宋，「爲汝南太守」，據宋書索虜傳和魏書薛安都傳，知道李初古拔亦曾在汝南一帶，這是相同的第二點；「李重耳」曾在後魏時「拜恆農太守」，李初古拔亦嘗爲弘農太守，弘農卽恆農，後魏以避諱改稱恆農，這是相同的第三點；「李重耳」爲宋將薛安都所陷，李初古拔爲宋將薛安都所擒，這是相合的第四點；「李重耳」的「兒子」李熙爲金門鎮將，李初古拔的兒子李買得亦爲金門塢戍主，地名與人事之巧合，這是「李重耳」故事和李初古拔事蹟相

合的第五點。至於「李重耳」這一個傳說人物的產生，可能是偽造出來的！關於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在他的近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中曾提出一很堅強的理由，他說：

『李重耳爲汝南太守一事，徵諸上列史實，絕不可能。蓋既言爲宋將薛安都所陷，其時必在元嘉二十七年，當時前後宋之汝南太守其姓名皆可考知，鄧道隱則棄城走，徐遵之則去郡，陳憲則先行郡事，後以守城功擢補實官，故依據時日先後，排比推計，實無李重耳可爲汝南太守之餘地。』

而李初古拔的兒子李買得，却曾做過屯駐汝陽（本屬汝南郡）的永昌王長史。資治通鑑記永昌王屯汝陽事於元嘉二十七年三月，記李初古拔被擒事於同年閏十月。可見李初古拔的事蹟都可徵信，而李重耳一名，竟可斷定他是影戲李初古拔的！

李初古拔既爲胡人，則李唐應出蕃族之後。史稱李淵的祖父李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亦受胡姓，當然和胡族的關係很深。李淵的母親是獨孤氏的第四

女（即元貞皇后），可見李淵的血統已不屬於漢族嫡系。李淵又娶竇毅之女，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等四人。而竇毅却是匈奴之後，見北史竇熾傳：唐太宗又娶鮮卑長孫晟女，生廢太子承乾及高宗等，也都有外族的血統。我們認為李唐屬鮮卑血統，多少是可以推定的。陳寅恪先生又據河北隆平縣唐光業寺碑及巴黎圖書館所藏燉煌寫本伯希和號唐代祖宗忌日表等研究的結果，覺得李唐或可能是胡漢混合種，陳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一章中曾說：

『綜合推論，頗疑李唐先世本爲趙郡李氏柏仁一支之子孫，或者雖不與趙郡李氏之居柏仁者同族，但以同姓同居一地之故，遂因緣攀附，自託於趙郡之高門，衡以南北朝庶姓冒稱士族之慣例，殊爲可能之事。總而言之，據可信之材料，依常識之判斷，李唐先世若非趙郡李氏之「破落戶」，即是趙郡李氏之「假冒牌」。至於有唐一代之官書其記述皇室淵源，間亦保存原來真實之事實，但其大部盡屬後人諱飾誇誕之語。治史者自不應漫無辨別，遽爾全部信從

也。」

要之，從魏晉以來，外族如鮮卑等之移居中國北部的。爲數極爲可驚，經過東晉南北朝兩三百年的長久時期，有的已漸漢化——同時也有胡化的漢人；胡人中帶有濃重的外族氣息的，當然仍不脫其原有的種姓和習慣。有時從習俗上去研究，就可以推斷這一個人的出身和種族。

在李唐的初期——尤其是太宗，皇室的習俗，實帶有很特殊的異族色彩。

近人劉盼遂先生嘗作李唐爲蕃姓考一文，證明唐的皇室係出於代北鮮卑族。他曾舉出七種證據，推證李唐必出胡族：

第一，據劉餗隋唐嘉話一書中所載，隋末有一個人名叫單雄信的，本來是李密的部下，他在李淵的第四個兒子元吉包圍洛陽時，對元吉稱呼：「胡兒！不緣你，且竟了！」單雄信稱呼世民的兄弟元吉爲「胡兒」，這顯然是李唐爲胡人之一證。隋唐嘉話所記的，出自隋末唐初時人的親見親聞，故不失爲一有力的證據。傳世帝王像，獨唐太宗深眉高鼻，亦胡貌之徵；

第二，據舊唐書高祖諸子滕王元嬰傳：狀貌類胡而豐碩，滕王涉尤見特殊，亦胡貌之證；

第二，這一點，是最關緊要的一項證明。據唐代釋彥琮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下記載：

「貞觀十一年春，帝（太宗）親降問法師（沙門法琳）曰：朕本系老聃，東周隱德，末葉承嗣，起自隴西。何爲詭刺師資，妄陳先後。無言卽死，有說卽生！」

法師對曰：琳聞『拓跋遼關』，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卽其苗！非柱下隴西之流也。謹案老聃之李，收母所生；若據隴西，乃皆僕裔。何者？敦煌寶錄云，桓王三十九年，幸閑預廷，與羣臣經夜論古今。王曰，老聃父爲何人也？天水太守臺綏對曰，老聃父姓韓名虔，字元卑，癡跛下踐，胎卽無耳，一目不明，孤單乞貸。年七十二無妻，遂與鄰人蓋壽氏宅上老婢字曰精數合，懷胎而生老子。又王儉百家譜云，李姓者始祖泉繇之後，

爲舜理官，因遂氏焉，因稱姓李；李氏之興起于聃也。以李樹下生，乃稱「李」姓。至漢成帝時有李隱抗烈毀上，被誅。徒其族于張掖，在路暴死，其奴隸等將其印綬，冒涼得仕。所謂隴西之李，自此興焉。……竊以拓跋元魏，北代神君，達闐達系，陰山貴種，經云以金易鎗石，以絹易縷褐，如捨寶女與婢交通，陛下卽其人也；棄北代而認隴西，陛下卽其事也！

帝時大怒，豎目問法師曰：「朕聞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實由先古。何謂追逐其短，禽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爬毀朕之祖禰，謗黷朕之先人。」

法師對曰：「琳聞文王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答。孝弟之性，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時憲司執奏曰：「法不可廢，國有常刑。諸指斥乘輿者，罪當大辟！」
帝曰：「法琳雖毀朕祖宗，非無典據。特可赦其極犯，徙在益部爲

僧。』夏六月，法師行至百牢關菩提寺，因若痢疾而卒。」

這一節故事不見於其他書籍，僅保存在佛門的傳記中。其中雖則有可能出於法琳過甚其詞的地方，但他明指太宗是出於代北拓跋氏之後，當然有事實爲其背景。劉先生認爲這是一條鐵證，陳寅恪先生也特別注意過這一件事。（劉先生原文發表於民國十九年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第四點，據唐書選舉志載，太學中有「國語」一科。所謂「國語」者，原由拓跋魏初定中原，軍中號令都說的是蕃語，後漸染漢人習俗，自己原來的蕃語，却疎忽了，於是教一些青年特加傳習，稱爲「國語」，這些語言亦即陰山一帶鮮卑人的土話。可見是李唐皇室不忘鮮卑舊俗之證；

第五點，唐書太宗諸子常愍山王承乾傳載，太宗的兒子廢太子承乾從小喜歡胡服胡語，隨從的人又都是「胡貌」，頭上又多用「椎髻」，承乾還不受住在長安而想跑到代北去，這都可以用常識推斷李唐皇室和蕃族是有密切關係的。

第六點，資治通鑑唐紀載：「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世民既殺太子與元吉，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之乳，號慟久之。」

世民在哀痛之餘，跪而吮高祖乳，這在漢人的習俗中是從來沒有的，大約是蕃禮的無意流露。

第七點，舊唐書肅宗本紀載「上匍匐捧上皇足涕泗嗚咽」，這也是一種奇特的習慣，只有在西域諸國有這樣的風俗。

從這幾點來看，李唐之系出蕃胡，大約已不成問題。這還是近二十年來的新發現！以前從沒有人想到李唐的先世原來是雜有外來的血統——朱熹雖曾提出過這個疑問，但並沒有加以追究；——而唐代這位開國元勳的英雄李世民，誰還想像得到他會有向高祖吮乳的滑稽劇呢？

我們說過了李唐的世系，就來講太宗的生平。

唐太宗姓李名世民，他的父親一共有二十二個兒子。其中四個兒子是皇后竇

氏所生，長子名建成，太宗是次子，三子名元霸，四子名元吉。元霸早死，他們這三人都是能幫助他們的父親李淵的。

太宗從小天資聰慧，貌亦不凡，及長更雄才大略，喜交結天下奇士。李淵在七歲時就襲上代的封爵，及長一直在隋室做官。隋文帝楊堅的皇后獨孤氏是李淵的乾娘，因此特見親愛，累轉外官，煬帝時做太原留守。因為李淵的上代封唐國公，因此李淵在得天下以後，還國號爲「唐」。

太宗自幼生長在山西，對於關中和西北一帶的情形自很熟悉。他知道隋帝國的創造者楊堅如何得天下，更看到隋帝國的如何崩潰。歷史警策了他，他眼見隋末的亂象已成，想安定中國，於是竟有了代隋之志。

當隋末大亂時，舉兵起事的原有一二十起。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最後成功的李唐。在唐太宗即位以後，廿餘年間，是唐代政治史上的黃金時代。唐太宗是被歷來的史家稱讚爲中國最偉大的君主的。太宗的爲人，如寬大能容，從諫如流，知人善任，而且也有魄力，這些地方都是他的長處；李淵如沒有這樣能幹的

兒子替他助力，他也許是不會那樣做到皇帝的。

太宗在中國固已幫他父親打下了天下，就是當時域外諸國，也都震懾他的威力。貞觀四年，西北諸國君長請上號爲：「天可汗」，於是他不僅是中國的皇帝，而且是塞外西域諸國共同擁戴的「天可汗」了！

唐太宗逝世時，年齡還不過五十二歲。他和漢高祖劉邦的壽命同年——劉邦也是五十二歲死的。太宗生於西歷紀元五九七年，即隋文帝開皇十七年，正在隋文帝平陳之後，在歐洲正是東羅馬帝國大亂時代；世民死於紀元六四九年，即貞觀二十三年。他比他父親李淵享壽爲短，李淵活了七十歲，世民的兒子高宗享壽五十五歲。太宗和高宗都不能說壽長，這一點，據有人研究說，一半由於辛勞，一半由於多慾。

太宗的一生，歷來史家評論者很多，大致認爲他是人君之不可多得者。如要描寫他具體的生平，最好引證太宗自己表白自己的話。在太宗未去世時的前兩年，太宗曾說過一番話，按資治通鑑載：

『貞觀二十一年五月庚辰，……上曰：「……朕所以致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踐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又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

太宗的這一番話，不但使人欽佩，實在也是至理名言。從這裏可以看到太宗的治世用人，自有他過人的懷抱和見識，而應世的態度和方法，也都涵養在這一番話裏面。本來，在中國這個古老的社會中，「世道」和「人心」幾乎是處世待人不能不先注意的課題，你的事業欲求發展，除了培植自己的技能和學識之外，這方面亦得下些「經世」的功夫。若要作領袖人物，那更是不必說了！歷史上

每逢亂世，「揭竿而起」或「弔民罰罪」都不難，即使要「登立爲帝」，只要你看清時機而有這種方法和勇氣也不難；所難者却是當他做了「人主」以後，第一需要「量」和「識」，其次就是治世用人的問題了！太宗的這一番說話，倘使的確出於他自己之口，而沒有經過別人的潤飾，正可讚美他個人的成功處。至少，他能說這番話，也是令人欽佩的！

從此可見唐太宗的爲人，他懂得一個領導人物應具備的條件。換言之：唐太宗之所以能成爲一代人主，這短短的一節表明，未始不足做他一生的描畫！

四 玄武門之變

接着，我們應敘述一件唐初發生在皇室裏的大事，就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門之變。這次事變是一幕大悲劇，倘如當時的導演者換了方式，唐代初年的政治會變成另一種局面。

這幕悲劇的起因結束，是這樣經過的：

當唐高祖李淵初起兵時，一切規劃事宜，出於世民謀策的居多。高祖曾對他說：「若事成，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世民聽了，一面叩謝，一面謙讓。後來高祖得了天下，立長子建成爲太子，封太宗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其時高祖也知太宗勞苦功高，就特置「天策上將」的頭銜位置太宗，爵位在王公之上，並命開府置屬官。這樣安排以後，高祖以爲各得其所，不會有什麼問題了。但太子建成却不像世民那樣精明強幹，而且喜歡漁獵和酒色；元吉也不很能幹。高祖對於這三個兒子，本來都並不見得偏傾的，後來因太宗功名日大，很想

改立他爲太子。這點意思漸被建成知道，心裏自然不高興，由疑懼而暗中同元吉計謀陷害世民。其時高祖晚年所生諸王，他們的母親都擅寵後宮，親戚並分事諸府。建成和元吉同一般嬪妃過從甚密，這些嬪妃在高祖面前奏說：

『至尊萬歲後，秦王（世民）得志，母子定爲子遺，……』

一面在高祖面前哭泣起來。這些嬪妃又說：

『東宮（指建成）……慈厚，必能養育妾母子。』

高祖聽了這種話，大爲感動，自此對於世民漸漸疏遠，建成和元吉也漸蒙恩寵。本來這些嬪妃與世民之間是很隔膜的，如嬪妃中張婕妤的父親，爲請高祖轉賜幾十頃已經由世民贈給淮安王神通的田，曾發生摩擦；尹德妃的父親，也爲了一件小事和世民不快，甚至連王府屬官杜如晦的手指都打斷了一個，高祖聽到這些事，曾怒責世民說：

『我嬪妃家，猶爲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

世民雖加解釋，高祖終不信任他。世民和建成元吉以及妃嬪之間的裂痕既

深，雙方的摩擦到了頂點，幾無時不可發生出事變來。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從速除了太宗，且自告奮勇，說：「當爲兄手刃之！」這句話是多麼忍心！有一天，世民跟着高祖跑到元吉那裏，元吉事先知道，預先在房間裏埋伏好一個護軍宇文寶做凶手，打算在世民時來，就一刀刺死他。建成知道這個陰謀，却止住了元吉，不准元吉行凶，元吉非常惱怒，對建成說：「爲兄計耳，於我何有？」這句話是說：「我爲你老兄着想，我原有什麼好處呢？」

後來，建成在長安和別的地方招募驍勇的壯丁二千多人，做東宮的衛隊，分駐在左右長林門，號爲「長林兵」。一面又叫以前在東宮的屬下楊文幹——這時楊文幹在做慶州都督，——私地招募勇士，送到長安去，以便必要時隨時發動。高祖武德七年，御駕到仁智宮（今陝西洛河之西）去；建成在長安留守，世民和元吉隨行。建成暗中囑咐元吉，將世民看機會了結他。又叫人送盔甲給楊文幹，叫他起兵，以便內外夾攻。不料派去的人走到半路，將這謀劃去告訴了高祖，高祖大怒，立刻召建成到仁智宮去。建成初不敢去，有人勸他率性起兵造

反；也有人勸他趕快到高祖那裏去謝罪，建成總算聽了這個勸告，跑到仁智宮去，向高祖叩頭謝罪，自擲幾絕。高祖將他監在軍中，一面派人去召楊文幹來。文幹知道不妙，就發兵謀反。高祖把世民叫了來，對他說：

『文幹事連建成，想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當封建成爲蜀王。』

世民走了，元吉同妃嬪等竭力爲建成討饒，朝臣中也有人替建成說好話，高祖也竟怒氣全消，改變了態度，仍命建成回長安留守，只責備了他幾句兄弟不應該不和睦的話。

但這時楊文幹的軍隊已攻下了甘肅寧州，世民的部隊趕去討平，楊文幹被自己的下屬殺死，將他的頭提到了長安來。於是世民和建成、元吉之間更種下了仇恨。

建成回到長安以後，與元吉更謀進一步的計劃。這三個人之間的衝突已經是無可避免的了，元吉在高祖面前竟請他殺掉世民，高祖不加譴責，只說：

『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詞？』

元吉且說：

『秦王初平東都，願望不還，散金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詞？』

一方面後宮說世民的壞話更厲害，高祖爲之疑惑不決。世民的屬僚都很憂怕，行臺郎中房玄齡向比部郎中長孫無忌說：

『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朝府塗地，實乃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

長孫無忌將這話告訴世民，世民召屬僚杜如晦等商量。結果長孫無忌等的意見，以爲「事急矣！若不行權，社稷必危！……」世民以爲然。武德九年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世民且自陳說：

『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爲（王）世充（竇）建德報仇！』

『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

第二天，世民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獨孤彥雲、杜君綽、鄧仁泰、李孟嘗等九人至玄武門，伏兵準備。建成元吉得到張婕妤宮妃的信息，知道將不利於己，建成和元吉謀劃，元吉認爲宜勒兵不朝，觀察形勢，建成以爲已有兵備，當入朝以問消息，於是兩人就都進去。走到臨湖殿，覺得有變故，立即迴馬，正想轉回，世民追上去射死了建成，元吉中了一箭，掙扎逃走，尉遲敬德在旁就射殺了他。於是東宮和齊王府的將帥薛萬徹等，集中了軍隊進攻玄武門。其時高祖正在太極宮海池中游船，得悉後大驚，問裴寂等說：「今日之事如何？」蕭瑀、陳叔等進說：「……今日之事，陛下如釋重負，蒼生自然又安。」這時秦王府的兵和二宮左右，戰鬥不止，尉遲敬德請高祖下手敕停戰，令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度，總算雙方的戰鬥纔停止。高祖叫世民進去，世民跪着吮高祖的奶，號哭很久。接着，建成元吉之子都被斬，世民就卽了皇太子的位。

玄武門之變的這一幕大悲劇既演出以後，世民是勝利了，而建成、元吉之失

敗，却並不能歸罪於這兩人的沒用。陳寅恪先生對玄武門之變曾細加研究，覺得這件事會如此結果，還有點特別的原因在。他說：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事變，爲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第一次，而太宗一生最艱危之苦鬥也。後世往往以成敗論人，而國史復經勝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見當時真相。然高祖起兵太原，建成卽與太宗各領一軍；及爲太子，其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徵之流決非庸懦無能者，又况建成以嫡長之名位，而內得高祖宮闈之助乎？太宗終能於玄武門一擊，而建成元吉倉卒敗亡，似此二人曾絕無計慮及準備者，頗爲不近情理，疑其間必有未發之覆，而相傳之史料復多隱諱之處也。』

又說：

『太宗之所以得勝，建成元吉之所以致敗，俱由一得以兵據玄武門卽宮城之北門，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門是也。然則玄武門爲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事變成敗之關鍵，至爲明顯，但此中實有未發之覆，卽玄武門地勢之重要，建成元吉豈

有不知，必應早有所防衛，何能令太宗之死黨得先隱伏奪據此要害之地乎？今得見巴黎圖書館藏燉煌寫本伯希和號貳陸肆拾李義府撰常何墓志銘，然後知太宗與建成元吉兩方皆誘致對敵之勇將，常何舊曾隸屬建成，而爲太宗所利誘，當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實任屯守玄武門之職，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竊發，迨太宗既殺兄弟之後，常何遂總率北門之屯軍矣。此亦新史料之發見足資補釋舊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

玄武門之變，其中還含有這樣一個關係成敗的原因，當然是爲研究國史者所當密切注意的！往往歷史上的每一件事，尤其是大事，因史料之僅存或不足，不易明瞭真相。玄武門之變還有太宗利誘常何的原因在，可見李世民也是善用計謀的人！

玄武門之變，給世民做定了皇太子，唐初開國時的一些才智之士，也被他拖了過來，等到他卽了皇位，就耐心幹了幾年政治，歷史上傳爲美談的「貞觀之治」，就是這位唐太宗建築起來的！

五 十八學士登瀛洲

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資治通鑑裏會載著一番唐太宗的話，關於他的治世任人，頗有令人可佩之處，大約並非是太不合事實的溢美。據通鑑載：

『（高祖武德四年）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爲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勛，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值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這十八學士的被召入選，是唐太宗一個莫大的收穫。這些人雖則是一批「文學館」裏的文人，但正如漢高祖劉邦之有蕭何曹參，他們無異做了李世民的智囊。

團。至於這些人選的決定，唐太宗似乎是有他的標準的，那就是真正的士大夫階級，便有入選的可能。我們只要看這十八個學士的出身，幾乎沒有一個不是仕宦之後，他們從小念過書，受過家庭的教養，有的竟成了一名「學者」。這些人被秦王世民收羅了去以後，却也鞠躬盡瘁，爲世民出力，後來有的做了太宗的大臣，他們因爲是仕宦之後，所以做起官來是很內行的。

從太宗所召集的這些學士看，實可察知李世民的思想和環境。後來在「貞觀之治」時期很做出點事情來的名臣如王珪、魏徵之流（這兩人都出身貧窮而曾爲建成屬下），在十八學士中就沒有這樣的人物。唐代的貞觀之治可說是中國文人政治的一個光彩時期，而完成這「盛世」的，就植基於士大夫之流。

十八學士中以房玄齡、杜如晦與唐太宗關係最密，太宗有什麼事也老是和他們商量。房玄齡爲人很機敏，綜理冊籍，明達吏事。他做尙書左僕射的時候，日夜盡心，惟恐一物不得其用。引拔賢才，惟恐不及。用法務求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因己長格物。這樣的態度去治事待人，正是他的長

處。太宗常與玄齡謀事，玄齡必定說：「非如晦不能決。」等到杜如晦跑來商量以後，却總是用玄齡的計策，因為玄齡善謀，如晦能斷，兩個人合作爲政，往往恰到好處。房玄齡在年青時，曾有一個善於看相的人看見他，不覺讚歎說：「我看到的人多得很了，沒有見過像這位一樣的，他將來必定是一個大有作爲的人物。」後來他在軍中一見世民，就要好得像老朋友一樣。世民請他做了參謀。世民每次在作戰時，別的將佐都在前方爭取財寶，而玄齡獨收人物。所以幕府與諸將密切連合，人人願盡死力，這一點，以房玄齡的功力爲多。

杜如晦年少英爽，以風流自命，負才重節。高祖在平京都時，世民就請他做府兵曹參軍，參謀軍事。又做陝州總管府長史，其時秦王的府屬常多外遷，房玄齡曾對世民說：「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世民驚說：「非公言，我幾失之！」因此就留他在幕府裏。太宗即位後，請他做兵部尚書，封蔡國公，爲右僕射。

這幾位被世民邀去的學士們，所好的是並不能算「幫閒」人物。他們實實在

在做了一些事；而這些人的「登瀛洲」，多少使他們有了伸展才幹的機會，這似乎可說唐太宗的功業，是一半得力於此的！

六 太宗的武功

唐太宗在卽位以前，他的武功已很不小。高祖李淵奠定長安以後，先須用兵的是秦涼兩國。秦涼都是盤據一方藉圖稱霸的小國。秦主薛舉，涼主李軌，薛舉初僑居在今甘肅皋蘭縣一帶，擁有財富，喜交結一般豪猾。當隋煬帝在位時，薛舉曾稱帝蘭州，並叫他的兒子仁果，攻陷天水，就從蘭州遷都於此；復又領軍向東土入寇。太宗率軍進討，兩次戰敗仁果，並獲仁果的精銳部隊一萬多人，擒了仁果到長安，就將秦國平滅。其時李軌據守河西諸地，並在甘肅武威起兵，自稱河西大涼王。不久亦被消亡。接着又滅李密、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等，這幾個人都是不容易平定的。

其時，河北全爲竇建德所據；河南則王世充和李密相持。世充殺敗李密；李密降唐，又借名收撫山東，出關欲圖自立，爲唐將盛彥師所邀斬。世充於是殺了越王侗，自稱鄭帝。世充攻王世充，圍洛陽，世充求救於竇建德，建德發兵來救。

他，世民據虎牢迎擊，大破建德，將建德活活的捉了起來，王世充於是投降。第二年，建德奮將劉黑闥又起叛變，徐圓朗先已降竇建德，建德亡後，他也起來響應，被唐太子建成所破，北方總算大體平定。南方還有蕭銑占據的地方很大，滅王世充的這一年，也給唐將李靖滅掉。此外還有一個林士弘，退保江西餘干，未久死去，部下四散。當時攻城野戰，世民幾乎沒有一次不在行伍之間。

北方則有高開道，後來被他的部下所殺。劉武周却與一個上谷人宋金剛併力南向以爭天下。經世民痛擊，金剛大敗北走。劉武周聽到金剛戰敗，大驚，急棄太原，逃往突厥，以前爲劉武周所陷的州郡，又重歸唐有。

等到太宗即位以後，更努力於武力的擴展。其時與域外種族關係最多的，是北方的突厥族。而太宗對於突厥，也先立下武功。

突厥在隋末，號稱「控弦百萬」，他很輕視中國。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都對突厥沒有辦法，都只敢尊敬他。李唐初起時，也會引以爲援，上面已經說過了；但後來突厥漸漸驕傲起來，常爲邊患。高祖武德

七年，派「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去避他，太宗時，先誘突厥分裂爲二，頡利與突利二部既分，在貞觀四年，遣李靖、李勣、柴紹、任城、王道宗、衛孝節、薛萬徹六總管，率軍十萬，前討突厥，擒住了頡利，於是東突厥悉平。

其時北方的鐵勒，和頡利已失聯絡，也背叛頡利，推薛延陀回紇爲主，國內又遭遇天災，因此勢力大衰。等到頡利可汗被唐行軍總管張寶相捉住以後，突厥部衆一時潰散，有北降薛延陀的，也有西走西域的，來投降唐的也有十多萬。太宗起初想把他們留在塞內，以便歸化中國，後來覺得不大妥當，就叫突厥人中來投降的蕭思摩做可汗，仍舊命他留居河北。這時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已遷居到突厥故地，——真珠可汗在突厥還沒有亡的時候，太宗就册封他做可汗，以「樹突厥之敵」；——形勢轉強。蕭思摩不能駕馭這些突厥部衆，又逃回中國。後來真珠可汗死，薛延陀內亂，太宗趁這機會就將他滅掉。於是回紇就遷居薛延陀故地。鐵勒的強部，就算薛延陀和回紇；薛延陀既滅，回紇在北方還沒有好好立

足，對於中國，只得奉命惟謹。太宗將薛延陀滅掉以後，北方就安定下來。於是突厥族自回紇以下，都尊唐帝爲「天可汗」，這些部落的酋長併請唐室開闢一條「參天可汗道」以便朝貢，太宗答應了他們，並置燕然都護府的鬱督軍山（在杭愛山附近）作爲統治北荒的機關。至於東突厥的故地，則在他的南部置十州，由定襄、雲中二都督府管轄。

其時，西部有吐谷渾和吐蕃。吐谷渾伏允可汗，在隋末就常入寇，邊界的郡縣都沒法抵禦他；唐初還是如此。貞觀八年十二月，太宗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帶領侯君集、李道宗、李道彥、李大亮、高甌生、薛萬鈞等六總管去討伐，第二年，大破之於庫山（據丁謙說，庫山在青海東北）；伏允可汗西走。李靖將軍隊分爲兩路：李靖自己和李大亮、薛萬鈞往北路出吐谷渾之右，侯君集和李道宗往南路出吐谷渾之左。李靖率諸將戰於曼都山（在青海東北，和碩特之南），丹噶爾南的牛心堆、赤水源、赤海等地，都被攻落。伏允可汗逃到羅布泊南的圖倫磧，想去依附于闐，被追兵趕到攻入，伏允無法，只得自殺。侯君集登

漢天山，戰烏海，斬獲很多。在空荒中走了二千里，過了一個月，到了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看黃河的發源處。這次李靖的西征，戰功是相當偉大，從漢代以後，從沒有這樣廣遠的發展。

李靖等的軍隊回來時兩路會於大非川（今雅瑪圖河），破邏真谷，餘衆也都投降。吐谷渾平靖以後，在他東面的國黨項也內附了！

其次，再說高昌：

高昌，在葱嶺之東，就是漢代的車師故地。高昌王是中國人，詳見晉書和北史。高昌在唐初屬於西突厥的一部，高昌王麴文泰，在貞觀四年來朝，後與西突厥掠奪貢物，又破焉耆三城。貞觀十四年，遣侯君集、薛萬徹去討伐，俘獲高昌王，將高昌地改爲州府。這時在葱嶺以東的還有焉耆國，在喀喇沙爾之東，焉耆本來先派兵助唐討伐高昌，後來叛附西突厥。貞觀十九年，命安西都護郭孝恪出銀山道（庫穆什台地）去征討。焉耆都城四面有水，以爲保安無虞，郭孝恪「倍道絕水」攻破了焉耆城，焉耆於是投降。

龜茲亦葱嶺以東之一小國，唐初時常來朝貢，後來也做了西突厥的附庸。唐伐焉耆，龜茲遣兵援助。貞觀二十一年，詔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等五將討伐，離龜茲王城三十里處，大破龜茲部衆，龜茲國王棄城逃走，追逐至六百里以外。龜茲國王逃到撥換城（今拜城縣西境）；被圍月餘，終於將他捉了起來。龜茲國王的臣相帶了突厥兵來作戰，又接連攻破他，前後共攻陷五大城，於是西域震懼，唐命安西都護府移到龜茲國，統管于闐、碎葉、疏勒等四鎮，至此天山南北路和吐火羅（原在大月氏南境地，東起帕米爾，順阿克蘇河西入阿母河，凡河南北及南面山間地，都在吐火羅範圍以內）及昭武諸國（撒馬爾罕和布哈爾一帶）都一併內屬。唐的武功，也遍及西域了！

此外，中天竺摩伽陀王尸羅逸多，自玄奘到他國裏去後，再遣使朝貢，唐室於是遣右率府長史王玄策，出使諸國，還沒有到達，中天竺王已死，國中大亂。臣子那伏帝阿羅那順篡立，盡發兵抵抗玄策，玄策從騎三十人，接戰不敵都死，玄策挺身走吐蕃，檄召鄰國軍隊，吐蕃發精銳一千二百人，泥婆羅亦發七千人助

戰。玄策部分進戰茶罽和羅城（即中天竺都，又名曲女城）；三日攻陷，斬頭三千，溺水死的有一萬人。阿羅那順棄國逃走，還想合散兵復戰，又被唐將打得大敗，將他的妃子王子都一併俘獲，虜男女一萬二千人，投降的城邑有五百八十所之多。東天竺送了牛馬三萬勞軍。貞觀二十二年，原派到中天竺去的副使蔣師仁將俘虜來的人一起帶回獻在太宗闕下，這一行人的凱旋歸來，真使唐的武功震驚諸國。於是西域的道路大通，唐帝國的聲威也震動了亞洲全部。

此外，太宗還征伐高麗。太宗既用兵如神，戰無不克，對於東方也很想擴張勢力。但在征高麗一役，却化費了不少時間和人力物力。

貞觀十六年，高麗王建武被臣下蓋蘇文所殺，太宗知道這事，就說：「高麗職貢不絕，賊臣弑逆，朕甚哀之。但山東彫弊，未忍言用兵耳！」不久，高麗謀攻擊新羅，新羅王乞援；太宗想親自去討伐，就到洛陽，詔張亮李世勣先帶領軍隊出發，太宗又親率諸軍自洛陽往征，這時已在貞觀十九年。李世勣攻至遼東城下，已二十天，還不能攻入，太宗引兵助戰，遼東於是陷落。接着又攻克白巖、

安市。這次作戰，太宗自己部署奇兵，除了幾個久戰的名將以外，還有龍門人薛仁貴，衝鋒陷陣，勇於作戰。太宗在攻克安市以後，將當地的北山改名爲駐蹕山，刻石紀功。而高麗失此要郡後，已全國震驚，再不敢輕易求戰。同時太宗動員在遼東的軍隊，因出征的時間已久，再加天寒水凍，糧食將盡，士卒難以久留，太宗於是下詔班師，征高麗之役暫算告一段落。

此外還須一說契丹和奚。契丹和奚，唐初都曾來朝貢，太宗伐高麗時，發兵從征有功。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酋長窟哥，奚酋長可度，都帶了部屬來中國內附。於是將契丹部置松漠都督府，將奚部置饒樂都督府。在今熱河松嶺附近和翁牛特左翼一帶，也都歸入唐室的政治勢力圈之內。

綜觀貞觀時代，用兵絕域，使遠荒諸國都懾服於唐的聲威，這樣的武功可說已追上秦漢。太宗一生，從十九歲時起兵，二十四歲平滅羣雄，二十九歲君臨天下，使國威遠揚，惠中馭外，而且還親自作戰，這比秦皇漢武，自無愧色。

唐紀曾說：

『（貞觀三年十二月）遠方諸國來朝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

唐會要卷一百亦說：

『（四年三月）諸蕃君長詣闕，請太宗爲天可汗，乃下制，今後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蕃渠帥有死亡者，必下詔冊立其後嗣焉。統制四夷，自此始也。』

所謂「百蕃侍子宿衛於殿陛，四夷世子填咽於國學；不僅爲中邦之大君，實乃世界之共主。」這都可爲太宗武功的讚美之詞，而並非不合事實的。

然而太宗一生，他之所以能立功域外，遠揚國威，固然多半由於他的英勇有爲，一半亦有其相對的原因在。隋代所未竟之功，到太宗時都有了收穫，這有環境造成的原因在內。陳寅恪先生對於這一點他有很深刻的新意見說明。他說：

『李唐一代爲吾國與外族接觸繁多，而甚有光榮之時期，近數十年來考古及異國文籍之發見移譯能補正唐代有關諸外族之史事者頗多，……茲所欲論者

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連環性，二曰外族與內政之關係，茲分別言之如下：

所謂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獨與唐室統治之中國接觸，同時亦與其他之外族有關，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強大可致某甲族之滅亡或衰弱，其間相互之因果雖不易詳確分析，而唐室統治之中國遂受其興亡強弱之影響，及利用其機緣，或坐承其弊害。故觀察唐代中國與某甲外族之關係，其範圍不必限於某甲外族，必通覽諸外族相互之關係，然後三百年間中國與四夷更疊盛衰之故始得明瞭，當時唐室對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蓋中國與其所接觸諸外族之盛衰興廢，常爲多數外族間之連環性，而非中國與某甲外族間之單獨性也。」

（見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九十四頁）

這番話的意義固可糾正中國人一向妄自尊大的觀念，其實亦不獨中國與外族爲然，整部人類的世界史都可作如是觀的。正如新唐書四夷傳總序略所說：

『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

變，記唐所由亡云。」

例如中國與突厥接觸，倘使正在突厥衰弱的時候，中國和他交戰，當然是中國獲勝，這不一定是中國的武力了不起。反之，在突厥強的時候，中國就被他侵略了！這一點，就不是所謂「單獨性」的看法。因而陳先生又說：

『又唐代武功可稱爲吾民族空前盛業，然詳究其與某甲外族競爭，卒致勝利之原因，實不盡僅由於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國武力攻取之道，而爲之先導者也。國人治史者於發揚讚美先民之功業時，往往忽略此點。……』（見全上九十四頁）

據此觀點去看歷史，則如北突厥或東突厥的敗亡除與唐爲敵外，其主因一爲境內的天災和亂政，二爲其他鄰接部族回紇薛延陀的興起，有此兩個原因，於是給中國以可乘之機。否則雖以唐太宗的英武，亦未必能招致那樣的戰蹟，這就是陳氏所謂「外族盛衰連環性」的例證之一，而這種解釋，當然是有相當的意義的！

總之，太宗一生的武功，可說是大半由於時勢所造成，一小半却是他的天才。沒有那樣相對的環境，太宗的武功，可能還會被埋沒一些。

七 太宗的治績

宋代歐陽修在新唐書太宗紀贊裏說：

「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政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歐陽修將太宗比並湯武成康，而且政治之美，自漢以來所「未之有也」！這是恭維的話，但是歐陽修的由衷之言。太宗的治績是自來所被人稱道的。究竟太宗的政治有什麼了不得的完成，或者有什麼建樹？說來到很簡單。就是知人善任和勤政求治而已。劉昫在太宗紀贊裏稱頌他說：

「發迹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所以屈突尉遲，由仇敵而願傾心膂；馬周劉洎，自疏遠而卒委鈞衡。終平秦階，諒由斯道。……迹其聽斷不惑，從諫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

太宗的能够用人，這確是他的長處。本來人各有所長，正如李白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只在於如何用法和用的機會而已！愈是領導人物，愈要研究任用人的心理和方法。歷史上一般做領袖的人，大都還有忌才的毛病，這是最要不得的，其原因多半由於做領袖者自己之缺乏才能。太宗則自己的能力既強，用人的態度亦好，所以他能夠將政治弄得像樣，並不是偶然的。

太宗的父親高祖李淵是一個比較平實的人，只有謹慎一點，可說是高祖的長處，用人的成績却並不好。高祖在位的時候，宰相如僕射裴寂，中書令封德彝，待中裴矩，都是隋室的佞臣。所以武德年間，以致賄賂公行，綱紀紊亂，內政自然不好。太宗即位以後，任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諸賢臣，將武德年間的政治大加改革，一時面目一新。房、杜二人本來跟着太宗已久，這兩人原是輔弼之材，太宗能信賴他們，這就是太宗成功的地方。

魏徵王珪，原是太子建成所用過的。太宗召魏徵拜他爲諫議大夫。魏徵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有什麼事放不住在肚裏，想到要說就說，太宗也並不討厭他。

太宗每問政事得失，徵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貞觀三年，守祕書監王珪、房玄齡、杜如晦參預朝政，專以仁義勸太宗，遂成貞觀之治。

貞觀十三年夏天，魏徵對太宗曾說：「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餘條，」太宗深爲歎賞。因爲魏徵很誠懇切實，所以太宗很尊敬他。有一次，太宗臂上養着一隻鷓鴣，遠遠看見魏徵過來，忙把鷓鴣放在懷裏，後來魏徵奏事太久，鷓鴣竟在懷裏悶死了。這雖是一件小事，可見太宗的對人和處事，都還不肯敷衍苟且的。

後來魏徵死了，太宗很記念他，臨朝時歎着說：

「人以銅爲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鑑，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鑑，可以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

大略如此。朕類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

於此可見太宗用人的一斑。再如唐書長孫無忌傳載太宗對長孫無忌的話：

「人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失，朕當先攻公等瑕瑜；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唐儉善和解人，然事朕二十年來，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謹審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不可倚；岑文本文章議論是其所長，謀慮經遠自當不負於心；劉洎堅正不輕然諾，能自補缺；馬周敏銳直道而行，所任足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以親朕，若飛鳥依人，人自憐愛之；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罕得其匹，然總兵攻戰，無所長也。」

這尤可見太宗有知人之明。太宗不但能用人、知人，而且他對於自己得力的部下，又殷勤懇摯；例如在征高麗之役，李思摩中流矢，太宗親自去吮他的血，將士們聽到這件事，有的甚至感動得流淚。太宗一生能得人助力，他的接物對人是最值得稱道的。

太宗用人有兩種長處：一是取人不求全。太宗曾說：「君子用人如器，各取

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哉？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這種眼光真是透闢得很；其次，太宗用人能內不避親，外不棄讎，他要立長孫無忌爲相，長孫后再三勸諫，他也不聽，終立無忌爲右僕射；魏徵王珪都曾在建成屬下，以往想除掉太宗的，在建成失敗後，太宗不念舊惡，仍舊能用他們，這也是太宗能任人致治的一個原因。至於太宗之從諫如流，亦是他的第一大長處。本來，像「杜（如晦）之能斷大事」，「房（玄齡）之善建嘉謀」（舊唐書卷六十六房杜傳略）；王珪之「標鑒通晤」，都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後期則有長孫無忌、高士廉、唐儉、楊師道、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等。貞觀十七年，詔命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烟閣，古來得人之盛，貞觀時代可謂冠絕前後。當時文武兩方面，都有極好的人材，唐代人物之多，貞觀時代是先開了風氣的。

太宗既是一個英明的人主，他知道天下的事，非一人所能屬詳。他曾對公卿說：「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荃者，亦足視矣。公輩宜

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他很願接受別人的忠告，魏徵前後曾諫二百餘事，太宗無不嘉納，這正是太宗的偉大處。

惟其太宗能接受別人的忠告，因此政治上有什麼要改進的地方，都有了時刻可能興革利弊的機會。貞觀時代政治能走上昌明的地步，太宗的「廣開言路」實在是一大原因。

例如魏徵所上的十思、十漸等疏，都是說別人所不敢說的，而太宗聽了頗以爲然，十思疏上說：

「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威之以盛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爲而治矣。」

魏徵忠告太宗要留意這「十思」，用意不可謂不善。而且他說明要國家「無爲而治」，所謂「無爲而治」的意義，是人主不必殫心竭慮化費很多的精神而政治能欣欣向上。這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要「選賢任能」。因爲國家用了賢人才能，他們自己本身能負責，用不到人主去命令他，他們已能把政治弄好，這是「無爲而治」的真意義。恰當太宗時代一些臣下，頭腦清明的較多，因此雖「廣開言路」，太宗又「從諫如流」，却並不因此而發生出什麼是非糾紛出來，這是貞觀時代的好現象。

太宗對於進諫的人，只要話講得對，他總是愛聽，並且還有賞。例如薛收（曾做太宗在軍中的祕書）諫獵，太宗賜給他金四十錠；孫伏伽諫元師律罪不當死，太宗賜給他一座蘭陵公主的園；溫彥博諫長安令楊纂失察罪不當死，太宗就赦了楊纂；虞世南諫田獵山陵之制不宜過厚，宮體詩不宜作，恐「天下從風而靡」，又諫切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太宗深願聽納，曾說：「郡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再如馮諫大安宮宜崇奉，宗廟宜親祀，樂工不宜賜官

等，太宗就將一座價值二百萬的大宅賜給了他；廬江王瑗姬在太宗身邊服侍，王珪進說：「陛下知瑗殺其夫而取之爲非，奈何又令侍左右？」太宗就叫瑗姬走開；王珪諫祖孝孫雅士，不應去教女樂，曾怒責王珪，但第二天太宗忽又悔悟。高季輔指陳時政得失，太宗賜給他鐘乳二兩，對他說：「卿以藥石之言進，故以藥石相報。」戴胄諫修洛陽宮，太宗極爲嘉獎；張元素亦諫修洛陽宮，以爲甚於隋煬帝，太宗對他說：「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張元素回答說：「若此役卒興，同歸於亂耳！」太宗歎息着說：「我不思量，遂至於此！」就命停止工事，賜元素帛二十四匹。太宗常論山東人物，張行成說：「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宜以東西爲限。」太宗亦嘉獎他，賜行成馬一匹，錢十萬，衣服一件。裴仁軌私下差役門夫，太宗要將他殺頭，李乾裕奏罪不應死，太宗就免他一罪。權萬紀將太子不曾教好，太宗也要殺他，柳範奏說：「房玄齡尚不能止陛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聽了很不高興，拂衣而入，過了一回，又召柳範，好好的慰勉了柳範一番。

總觀太宗之善納忠諫，實在是他早期政治的良好作風。他的所以能够這樣做，一半由於玄武門之變以後，他自己犯了殺害同胞的罪惡，這一件事是太宗的「慚德」，他即位以後，應該做個正人君子，不然他的天下也終於難保；一半由於他親見隋煬帝的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到全國瓦解他還像蒙在鼓裏，盜賊蜂起別人也不去告訴他，國亡身滅，終至爲天下笑，太宗深知拒諫飾非的足以招致禍害，前車之鑑，已做了太宗的現實炯戒，所以他能各方聽聽別人所說的話。等到太宗治績日隆，國家的基礎也漸見穩固，各方進諫的話也比較的少，太宗也稍稍改變，不隨便聽人指謫了！

太宗在位，對國家政事非常留心，他將上書言事的，都貼在屋壁上，以便進出觀覽，每每爲了政事深夜不寐。他對於行政人選十分重視。至於設施立教，尤極可觀。長安史臣吳兢所纂貞觀政要十卷，記載當時政情最詳。如說：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恆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上錄其姓名，坐臥恆看，在官如有善事，亦

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他將地方政治的基層看得很重要，這和太宗時對州郡制度的改革有關；且留在後面再講。太宗之修明治道，很有些深切的見解。如他曾對臣下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這番話正針對隋末的情形而發，所以他在給王珪的詔書裏亦說：「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已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都是以隋末的現實教訓，來警惕政事的。

太宗平時留心吏治，發現有人賄賂或舞弊，他就加以罪罰。而任用官吏，高級的就由他自己選拔。貞觀政要卷三曾說：「刺史朕當自簡選，縣令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太宗對「親民之任」既已所謂「簡自帝心」，故如新唐書循吏傳序中就說：「官得其人，民去愁怨。」太宗又時常派人巡察四方，不好的官

吏卽時罷黜，好的將他升用起來，問民疾苦，治績更見昌明。

貞觀十六年，據政要所載：「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值五錢，其尤賤處，計斗值三錢。因謂侍臣曰：……朕爲億兆人父母，雖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爲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自貞觀四年以後，國內安謐，「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齋糧。」（見新唐書太宗紀下）此後世論治者，必以貞觀爲典範。

八 唐初的制度與文教

其次，我們應當附帶一說的，是唐初的制度，以及貞觀時代的學術文教。

唐初，一切制度大都仍沿隋代之舊。而隋代却以北朝的制度來統一中國，唐時還只是北朝型制度的發展。例如，與唐代政治關係很深的府兵制，就源起於北朝，而完成於隋代的。所謂「府兵制」，有兩種優點：即「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和「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這是怎樣的制度呢？所謂「府」，猶今之管區制。現在有所謂「軍管區」「師管區」，管區的情形相等於「府」，「府」是單位的名稱。每府有折衝都尉一人，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它的基層組織，十人稱「火」，五十人稱「隊」，三百人稱「團」，分設「火長」「隊正」和「校尉」去統帶。據新唐書兵志和地理志載，全國共六百三十四府。陸贄奏議說全國有八百府，大約是合西域的軍府在內了。每府平均以千人計，全國有府兵八十萬。唐太宗時分中國爲十道，關中

道有府二百七十，占全國比率的最多數，這完全是沿襲北朝以來以關中爲本位政策的影響。府兵制是徵兵制，人民年達二十一成壯丁，到六十歲免役。有時由國家徵召，事畢後散而復業。

在中央並設有十六個「衛」，同時以此培養高級將領。十六衛設將軍三十人，屬官一百二十八人。一旦有事，就命將四出，事畢仍回中央。從貞觀到開元末一百三十年間，武臣軍隊，不曾有叛變的事，論者都以為是府兵制的效果。

其次，在太宗時代，關於行政區域的劃分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在隋文帝時，廢郡置州，爲一大變革，後來煬帝又改州爲郡，州郡已漸成相等的地位。唐太宗時又併省州縣，分天下爲十道，道之下有州，州之下有縣，於是古代最大的政治區劃名稱——州，便降於第二等地位了！這在貞觀元年，以民少官多，要改革這種弊端，就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但在行政統制上，却有其新的效用。

此外，太宗時刑法、田賦與選舉都仍沿北朝與隋代之舊。科舉制度到太宗手裏却更重視了！他將科舉制度作爲牢籠青年的唯一工具。有一天，太宗私自去視

察御史府（考試進士的地方），看到許多新考取的進士魚貫而出，便得意得很的說道：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這句話就是說：「天下的有爲青年都進了我的圈套了！」正因太宗之重視科舉，唐代的思想界很少新進的氣象。從這些地方看，李唐到太宗時代，唐帝國的基礎已經完成了！

其次，再說當時的文教學術。

太宗即位以後，就於門下別置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多萬卷，又在旁邊設一弘文館，選拔官僚中的學者們兼充學士，取三品以上官僚的子孫爲弘文館學生，又於東宮置崇文館，增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人。於是四方學者，都雲集京師，連高麗、百濟、新羅、吐蕃、日本都派子弟到中國來留學，國學生徒增加至八千餘人，國學之盛，爲近古所未有。經學則自南北朝以來因地域與政治環境不同而分的派別，至此則匯成

一流，使士宗一義，無形中給經學固定了一種標準，——就是孔穎達與諸儒所撰定的五經正義，成了古往今來學術與思想的權威之作；——因而學術的自由伸展簡直是根本談不到。再如修史，史書雖有好幾種，似頗爲整理，但都出於「欽定」，因爲史由官修，就多忌諱而少有信史，其中還有改頭換面的地方，所以唐代的史書，並不足觀，如太宗叫房喬編撰由褚遂良李淳風等佐成的晉書，就被人批評取材於龔除糠粃，爲史通譏爲「取悅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的。

當時的學校制度，雖粲然大備，但只成科舉的一個階梯，並非是專門講學之所。太宗雖亦宏獎學術，但在當時唐帝國的掌握之下，學術與文教只是專制政治的附庸而已！

九 結語

我們將唐太宗的一生，和他的事功都大略地說過了，這裏還有幾句話要補充。第一，李唐的興起，他的機會可說是最有利的！一切大帝國的基礎在隋文帝和煬帝時已有了規模，李唐的幸運很好，他在很多地方都可趁了現成。隋代自文帝養民生息以後，到煬帝時只要好好的幹去，一切都會有辦法。但是煬帝操之過急，他忘了當時的經濟情形是長期荒亂後剛剛復蘇過來的，人民無法接受較重的負擔，煬帝即使有雄心和建設的企圖，也終於是失敗了！

這從經濟基礎上也可略窺當時的政治背景。中國從三國到隋初的社會經濟，在這時期中，初時是幾個割據的軍人相互戰爭，繼而胡族入侵，中國鬧得不像樣子，人民除了死亡以外，便是各地流離，這時的經濟可說是瀕於崩潰的荒亂經濟。一切入於無政府狀態，當時除了建築堡塢憑藉莊園勢力的地主土豪和一些擁有士卒的軍人以外，只見流亡的羣衆與盜匪橫行。西北胡漢混合種李淵一流的人

物，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勃興起來的。

太宗的時代實較煬帝時容易建立功績，因為煬帝既已失敗，只要他能一反煬帝的作爲，他就容易得到人民的擁戴；就是煬帝所沒有完成的事，到他手裏也容易完功。而且還有一種原因，譬如在隋煬帝時，突厥的內部勢力並未衰弱，煬帝要去征討他，不但會事倍功半，而且是勞而無功；在太宗時，突厥內部勢力日衰，唐代對日衰的突厥作戰，自覺事半功倍。這是李唐時代的機會較好，也是所以能立功域外的原因。

同樣，如隋代的三次東征，並非不是煬帝的雄才大略，結果是功敗垂成，叛亂者王薄還做了一個無向遼東浪死歌，來勸告大眾；而太宗總算在征高麗之役能紀功勒石，這也是環境有異而得到不同的結果的。其實隋代的二次東征，還給李唐在遼東打了一個先鋒。

太宗時，西域諸國都尊稱他爲「天可汗」，自來傳爲民族佳話，但在隋文帝時，突厥亦上尊號，稱隋文帝爲「聖人可汗」，或稱：「聖人莫緣可汗」，莫緣

也就是聖人的意思。再如隋末喪亂，中國人多臣於突厥，亦有得「可汗」的封號的。總之，在一個人成功以後，好的事情都會附到他身上去，或者是格外說得神奇偉大，歷史上這種例子很多，太宗之得「天可汗」之名，其實也並不怎樣希奇的。

從另一面說，能看到社會的情形而相當處理，這是完成功業的唯一條件，否則就容易失敗。譬如洛陽這個地方，從三國以來就破壞不堪。三國志說，董卓離洛陽的時候，殺人放火，因之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其慘苦達於極點。繼之以三國爭霸，兵荒馬亂，洛陽毫無恢復的希望。晉書地理志說：「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板蕩，關洛荒蕪。」晉代時懷愍二帝在洛陽都無力建設，等到洛陽爲胡寇所圍，據晉書食貨志說：「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煙火，飢人自相啖食。」晉書孫楚傳中亦說：「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并堙木刊，阡陌夷滅，生靈茫茫，永無依歸！」到南北朝初年，宋劉裕到洛陽時，看見這種情形，就非

常痛心的說：

『伊洛榛蕪，津塗久廢，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鍾篋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塵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見六朝文絮傅亮：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隋煬帝對這種情形就並不注意，於故都長安外，更營洛陽爲東都，鑿太行龍門，築爲御道。結果是更加重了人民徭役與消費的負擔，隋末起兵的叛變人物中，最有力的李密和王世充二人，就在這一帶發動叛變。太宗時也想經營洛陽宮，戴胄和張元素都竭力諫阻他，太宗幸而聽了他們的忠告，不然天下方定就留意這事，也會招致人民的怨望。這只要看在鮑照的蕪城賦中所寫江都一帶已荒廢不堪，而煬帝立時想在那裏享受繁華，自然不免要失敗的！

其次，再說太宗的爲人，不但能幹，而且他還善用權謀而不露痕迹。他能考慮每一件事的成敗，倘使這件事不能不做而又無成功的把握時，他的方法就會轉變的。譬如太宗之征高麗，他既出口要去征伐，但也知道高麗不容易對付。他深

怕派去的大將還不够有力量，就親自再去，然而他又深恐師老無功，那時敗興而回，是要不得的。所以他在出征時就只預備穿麻製的單衣去，到回來時，還是穿的單衣。這意思是表示出征的時間決不會長，夏天出去，用不着等到冬天回來，就可以勝利的。其實太宗知道對付高麗是只能速戰速決，決不能曠日持久，因為到了冬天，遼東的天氣太冷，士卒既不能耐戰，糧食的接繼也很困難，倘那時一味硬幹，就會踏隋代征東的覆轍，只增加了人民的怨望。太宗在高麗時倒正是不脫單衣的，臣下都傳爲美談，士兵也都欽服太宗的英勇氣概，其實這是太宗的審慎處，也是他機智聰明的地方。

又如唐書太宗紀載：

『上入苑中，見蝗擾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曷食吾之肺腸，舉手吞之。左右諫以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有？』

太宗在宮苑中見到蝗蟲，竟捉來將它吞下去，足見他的關心民瘼，這種事給老百姓聽到以後，將怎樣的稱頌他呢！這雖是一件小事，而史書中特地將他記載

起來，由這些地方，正可看到太宗的爲人。

·再如舊唐書長孫無忌傳中曾載：

『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迴惑不決，御兩儀殿，羣臣盡出，獨留無忌及司空房玄齡兵部尙書李勣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膠，因自投於床，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宜拜謝，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曰：公等旣符我意，未知物論如何？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召百寮，必無異辭，若不舞踏同音，臣貧陛下萬死。於是建立遂定，因加授無忌太子太師。尋而太宗又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其事遂輟。』

太宗爲了皇位的繼承人選無法解決，心裏想立晉王，但晉王並非太子，這問題爲難極了；本來，太宗之英明果斷，他要這樣，別人也不會執拗的，然而他爲這事竟在長孫無忌和房玄齡的面前要跳到床裏去自殺了，這樣的行爲，似乎很滑

稽，其實我們顯然可以看出太宗的用意很深。在專制時代皇位的繼承者當然是長子，然而長子承乾却沒有用，而且得罪了，要改立晉王繼承，恐朝臣中不免要發生黨派的爭鬥，他要使這晉王的繼承問題不發生波折，使他的天下安妥穩穩的傳到他認為合式的兒子手裏，他只有在這兩個總縮全國行政財政軍政的大臣面前故意想尋死，使他們自動的替他解決，又使得他們對於未來的國主能盡心竭力，這想自殺的滑稽劇是有些效力的！這多少可說太宗是善用權謀的！

以上，我們將太宗的一生已作了個概括的敘述，對於李唐的如何發跡，李淵家世的源流，以及李世民的打平天下，和他生平的功業爲人，各方面都說到了一點。從這幾方面已可認識唐太宗雖是一個時勢造成的英雄，但他的精明強幹，和能體認時勢與人情，的確不是只能接承傳統之福的帝子們所能企及的不凡人物。而且太宗的氣度量比較寬大，這也是他的長處之一。

至於太宗的缺點，論者或以他的略好女色爲一弊病，這一點不免可貽人譏評。前面已說：太宗年壽不過五十二歲，尙不可謂壽考，有人以爲太宗除勞心足

以使生命虧耗外，多慾亦是一大原因。其實太宗的好女色的惡名，大半由於他曾招進了一位叛逆的女性武則天而來，因為武則天曾使太宗的政治傳統中斷；換言之，武則天是太宗的叛徒，而這叛徒，若非太宗之喜近女色，武周的一幕皇室革命或者不致發生。

自來言國史者，常不免偏重偉人的歷史觀。似乎有了這個人方纔有這以後的歷史，這觀念是錯誤的。個人對於社會全體可能發生或大或小的影響，但個人決不能概括社會全體，尤其是專制時代的皇帝不能代表人民。人民還是歷史的主流。不能「順乎人而應乎天」——這裏所謂天，就是人類社會的自然趨勢，——即使你是曠世奇才，也終於會被社會湮沒的。中國人的歷史觀最大的缺點是重在注意偉人的個人事蹟，而忽略了人與人所組成的社會活動情形。這多少受到孔子對哀公所說的「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這句話的影響。我們對於唐太宗的一生，就千萬不能用這樣的眼光去看他。這裏所寫的並不就等於是唐太宗這個人一生澈頭澈尾的總和，不過是一個不算詳盡的輪廓，從這裏僅可啓示讀者們去分析

他，去研究他。倘使我們有另一種從不爲後人所知而直接關於李世民生時史蹟的重要史料發現，那時，從新的觀點去研究的結果，對於唐太宗這個人的認識，以及或好或壞的評價，都可能和現在不同。現在我們所能比較確切的去認識他的方法，只有從各種社會關係方面去着眼，如從偉人史觀或英雄史觀的觀點去看他，那可能變成是一種意像的浮彫，和實際上的李世民是會有很多差別的！

這一點，作者特地在這冊子的書尾說明：我們對唐太宗的看法如此，對於歷史上任何人物的記述亦是這樣。讀者倘還有懷疑之處，就請從各方面去作更深一層的研究。

(完)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中華文庫唐太宗 (全一冊)
初集

◎定價國幣一元七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何天行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1326310)

7
40404/1
(1)

123



BC
27.42